

玉猪龙

出于虢国墓葬内的殓衾之上,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时期的作品。由青玉制成,豆青色,半透明,圆雕,通高4.8厘米,最宽处3.1厘米,厚度2厘米。从其头部向下贯一圆穿,颈部可见一横一小穿孔。椭圆眼,鼻间略有皱纹,吻部平齐,双耳耸立,整体呈C形作回首卷尾猪龙状。此猪龙顶部可见阴刻“田”字纹样,是典型的红山猪龙形象。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猪是财富的象征,故许多学者认为玉猪龙不仅是一种饰物,而应是一种祈雨求丰年的神器。

红山玉器的造型注重浅雕和浮雕的多样化手法,所选题材多是对仿生动物和自然现象进行的再加工,最鲜明的特色是既讲求整体的形似,也注重关键部位的神似,风格豪放质朴,不加细腻修饰;在制作工艺上,红山玉器的独到之处在于线条勾勒熟练,琢磨技艺精湛,二者相得益彰,经过匠人的精心雕琢,将动物的形象体现得栩栩如生,独到的技艺造就了其古朴苍劲之神韵。此器出于虢国国君墓,玉质上乘、造型优美、工艺精湛,时代较早,反映了国君对前朝玉器的喜爱。



龙首戈形青玉佩

出于虢国墓葬内的殓衾之上。青玉,冰青色有棕褐斑。通长5.45厘米,最宽处5.1厘米,厚0.35厘米。玉质润泽细腻,半透明。正背面纹样相同。上端为龙首,臣字眼,眼角带勾,张口卷鼻,上唇微卷,长角贴脊。下端为一戈形,三角形锋,有刃,援有脊,锋刃与边刃较锐利。龙口部有一圆穿。

佩玉习俗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殷商时期常见,到了周代随着玉器被赋予道德观念而人格化,用玉的多少、复杂的程度也成为人们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龙首戈形青玉佩是罕见的玉器精品,其造型优美,文化内涵丰富,印证了《礼记·玉藻》中“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记载,充分体现了虢国国君的等级、地位和财富,为研究西周礼制、用玉制度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背鸟蚕身玉龙

出于虢国墓葬内的殓衾之上。长6.2厘米,宽2.6厘米,厚0.65厘米。由青玉精制而成,冰青色。阴线片雕,龙首“臣”字眼,张嘴,屈身,“瓶形”高椅角向后翘起,腹部阴刻七道纹饰,分成八节。龙首蚕身,龙背上站一立鸟,鸟形态安详,昂首挺胸,傲然而立,身上刻羽纹,颈下有垂囊,长尾,是中国神话中“金乌负日”的太阳神鸟形象。玉雕巧妙地将龙、蚕、鸟三种形象融合于一体,反映了先秦思想中“蚕为龙精”的观念,是物质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衔尾玉龙

出于虢国墓葬内的殓衾之上。最大外径5.2厘米,宽1.9厘米,厚0.8厘米。青玉。深冰青色,局部受沁呈黄褐色斑。玉质细腻,半透明。器身为扁平体,龙盘近圆形,龙角贴背,上唇外卷,下唇下勾,尖尾衔于龙口内。正背面纹样相同,臣字形目,眼角带勾,身饰单排重环纹。龙口部有一小圆穿,龙爪处卷曲成一圆穿。其造型特点是龙身盘卷成环形,龙口衔接龙尾。这样的造型源于红山文化C形玉龙,兼具蛇的体态特征,是商周时期玉龙造型演化的特殊形态。



赏虢国墓地虢仲墓之玉龙

冯广丽

虢国墓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区北部上村岭,是一处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西周时期大型邦国公墓,虢仲墓是规模较大、等级较高、随葬文物数量较多的一座国君大墓,出土的玉器玉质优良,品类齐全且工艺精湛,多为精绝之作,其价值之高在周代考古中实属罕见。

西周时期盛行以动物为图腾的文化习俗,把对自然界的畏惧和对美好生活的希冀用一种徽号或保护神来代表。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异动物,《说文解字》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长能短,春风而登天,秋风而潜渊。”龙是吉祥、高贵、神圣、勇敢的象征,具有崇高的地位。在虢仲墓出土的玉龙佩中也多有体现,有红山时期的玉猪龙、商代的环形玉龙、西周早期的玉螭龙、中晚期的长尾龙等,包含了龙早期演变的各类型。现选出虢仲墓中独具特色的几件玉龙精品,以飨读者。



环状玉龙

出于虢国墓葬内的殓衾之上。青玉。冰青色,局部受沁呈黄褐色。外径2.6厘米,孔径0.7-0.9厘米,厚1.3厘米。龙首似猪龙,双叶状立耳,方形目微凸,吻部前伸,口微张。整体弯曲成圆环状,身中部有一道浅凹槽。玉质细腻,微透明。

猪与原始农业关系密切,人们在长期的农业劳作中捕捉动物特点,以及在龙身上寄托力量 and 希望,充分发挥想象力,运用象征、变形、夸张的手法,制作成温润晶莹、纹理细腻的玉器。环状玉龙来源于现实生活,极富想象力,造型优美、形态逼真、生动传神、栩栩如生,充分显示了工匠娴熟的技巧和高超的治玉技艺,善于捕捉特点和长于神韵表达的匠心,而且还洋溢着先民炽热的情感及对生灵美的欣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C形玉龙

出于虢国墓葬内的殓衾之上。青玉。深冰青色,局部受沁呈黄褐色斑。玉质细腻,半透明。龙身皆卷曲成C形。正背面所饰纹样相同,龙角贴背,龙上唇外翻,臣字目,眼角带勾,口微张,三角形尖尾内卷,身饰重环纹。口部有一小圆穿。最大外径4.5厘米,宽1.2厘米,最厚处0.45厘米。C形玉龙因身体蜷曲呈C形而得名,是红山文化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也是远古时期人类万物有灵的写照。其造型基本承袭商代形制,呈环状。龙身饰用单阴线,双阴线雕刻龙的轮廓,龙身以鳞纹、重环纹和卷云纹为主,龙纹由具体转为抽象。从新石器时代的图腾崇拜、商代敬鬼神神的祭祀神灵发展成为西周等级制度的礼仪用器,以及君子比德于玉的装饰佩玉,最终成为贵族阶级权利和地位、身份与财富的象征。

玉螭龙

出于虢国墓葬内棺盖板上。青玉。豆青色,局部受沁有黄色斑块。片雕。玉质较细,微透明。螭龙伏首,张口触地,近菱形目,一足前曲而卧,长尾拖地,后端上卷。口部和尾部各有一穿。长4.2厘米,宽2.5厘米,厚0.45厘米。龙头上有宝瘤状角,单足伏地而卧,长尾后端上卷,应为文献所谓的一足之夔。夔龙是龙的主要形象之一,夔,形与龙相似,《说文解字》云:“夔,神魅也,如龙、一足。”夔龙纹多出现在商晚期和西周时期青铜器的纹饰上,西周时期也作为玉器的造型出现,与其他龙的造型不同,它的形象多为张口、卷尾,一足的长条形,具有神秘古拙的美感。

虢仲墓出土的龙形玉器,设计思想和古代的祥瑞、瑞应、符瑞、禘祥及礼制尊卑相关联,从新石器时期的图腾崇拜,将其当作保护神,然后发展成为商代敬鬼神神的祭祀神灵,成为权利、身份、地位与财富的象征,为研究西周礼制、用玉制度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宁夏博物馆藏金代铭文铜镜赏析

李海东 李秋菊

铜镜,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特色的缩影。金代铜镜,以多元的时代风格,丰富的纹饰题材表现,铸刻铭文的史料价值等,日益为研究及收藏领域所重。金代铜镜,既传承吸收了中原铸镜文化的优秀传统,又融合体现了北方地区的民族文化特色,蕴涵了辽金时期的文化观念、民俗信仰。从实物发现看,其流传分布区域很广,工艺、形制、题材多样,也颇多开拓创新,双鱼镜享誉有加,人物故事镜亦别具一格,还多存留珍贵铭文,反映出世俗化、民族化及铸造管理模式等诸多特点。宁夏博物馆收藏金代铜镜十多面,多属传世品,亦颇具特色,现择数面介绍于下:

“犀牛望月”刻铭镜(图1)
直径12.7厘米,圆镜,圆钮,顶部较平,无钮座,素平缘。镜背图案铸磨非常精细,内区钮左上方横挂一轮弯月,两朵流云对称烘托于下。月右侧为星云图案,由星点与线段相连组成。钮周围水浪翻涌,其间似出没几株瑞草。钮下方有栏隔开水、岸,岸上跪卧一牛,体态健硕,仰首望月。外区大半周饰蔓草纹,余处阴刻“陕西东路铸镜所官(押)”八字铭文和一枚押记。西安市文物考古所、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宁夏固原博物馆收藏有与此镜图式及铭文完全一致的铜镜各一面。

“犀牛望月”菱花镜(图2)
直径11.4厘米,八出菱花形,圆钮,无钮座。镜背上方花瓣状流云托出半圆明月,两侧各四颗圆星,月中似有景物若隐若现。钮外水势滔天,间有峰峦错落,其间点缀云纹。钮两侧各有一条摩羯,龙首鱼身,背侧露出一鳍,大如翅,挺头翘尾,潜游于水中。左侧摩羯尾下探出一条大鱼头部。钮下方水中卷云托出一块礁石,一只牛伫立于石上,回首上望。近缘处布一周凸弦纹,间饰八朵流云纹。此镜图案为浅浮雕,犀牛望月、摩羯及鱼都是金代铜镜的典型题材。此镜式样同馆藏品还见有金上京历史博物馆收藏一面,吉林博物院1954年吉林江北出土的一面。

犀牛望月纹饰主要见于宋金铜镜,定窑、耀州窑一些瓷器中也曾出现,如故宫博物院藏宋耀州窑青釉刻花“犀牛望月”纹碗。关于这种纹饰题材,文博界早期普遍定名为“犀牛望月”。后又有“犀牛喘月”之说,此典故原意为南方吴地之牛,

暑夜惧热,故见月而喘。有学者认为,从宋金文献中有关“犀牛望月”或“坤牛望月”“犀牛涉大水”的记载看,此类传统纹饰具有美好吉祥的寓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从相关文物分布角度来看,宋金时期,犀牛望月纹饰在金朝兴起的东北腹地及南宋地域都有发现,且不仅限于铜镜,瓷器、钱币上亦有出现,说明此题材是当时兴起且较为普及的一种传统装饰纹样,体现了各民族间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承安四年铭四兽纹镜(图3)
直径9厘米,圆形圆钮,无钮座,折缘,镜缘稍外卷,缘高与钮高相同。背面以两周凸圆棱分隔内外,内区饰四个长尾兽同向绕钮追逐,兽的形态似鼠。外区于内外棱间阳铸楷体铭文“承安四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录事任(押),提控运使高(押)”。承安是金章宗所用第二个年号,共5年,承安四年为公元1199年。目前,承安二年、承安三年、承安四年、承安五年铭文镜都有发现,且内容大同小异,又称承安镜。宁夏彭阳博物馆藏有与此镜一致的金承安四年铭铜镜一面,1991年于宁夏彭阳县孟塬乡出土。镜式、铭文均与此镜相同,还见有故宫博物院收藏一面,陕西历史博物馆三面,耀州窑博物馆、铜川博物馆各一面。无独有偶,多集中于西北地区,反映出陕西是金代的一个区域铸镜中心。

此镜铸铭中“陕西东运司”与图1铜镜刻铭中的“陕西东路”,都是“陕西东路转运司”的略称。金仿宋、辽之制设转运司,为管理地方经济赋税的机构。据《金史·百官志》记载,金设十三路转运司,陕西东路转运司治京兆府(今西安市)。转运司职能为“掌赋税钱谷、仓库出纳、权衡度量之制”,其中“权衡度量”指负责度量衡器、铜器等物的发行管理。“陕西东路铸镜所”显系转运司的下属机构,专门负责铜镜铸造。金代铜镜资料中,另有“山东东路铸镜所”“南京路铸子局”之名,应该是与“铸镜所”同类性质机构的别称。铜镜的铭文说明,铸造或篆刻官府验记文字和押记,系金代铜镜的一大特点,亦证明了《金史》记载中的关于金代铜镜管理非常严格,铜镜由官府制造,并加以验记的史实。这与金代实行的较为严厉的铜禁政策及官府对铜镜铸造、销售实行的严格监管有关。从铭文判断,此

类带有铸镜机构名称及监造官员官职姓氏押记的铜镜为金代官府铸镜,是规范的官铸镜样式,代表由官府制造的标准器。

连钱纹铭铜镜(图4)
直径10厘米,八瓣菱花形,小圆钮,花瓣形钮座。座外饰连续且重叠的圆形方孔状钱纹,孔内饰五点状小花瓣,近缘处饰一周连珠纹,整体图案清新雅致,表达了财富汇聚的美好寓意。外区饰花叶和花蕊纹,阴刻“抱罕验论官”五字行书铭文和一押记。这件铜镜边缘上篆刻官府验印文字,也是金代官府对铜镜铸造实行检验监管制度的反映。抱罕,为甘肃省临夏市古称,秦汉置抱罕县,存至金末。临夏州博物馆藏有一件金代菊花纹刻铭铜镜,1977年出土于甘肃省临夏市南龙乡马家庄,亦篆刻有“抱罕验论官”铭及押记,此两镜刻铭可互为参照,是很好的地方史研究实物资料。

四花铭铜镜(图5)
直径12.3厘米,圆形,桥钮,花瓣钮座,素平缘。钮外环饰四组缠枝花卉,近缘处饰一周锯齿纹,缘上刻铭较浅,可辨出“平口府录事司验论官(押)”。花草纹是宋辽金时期流行的铜镜纹饰,此镜亦刻有官府验文字,金代特征明显。

柳毅传书人物故事镜(图6)
直径17.5厘米,圆形,银钮,无钮座,宽素缘。镜背分上下两组图案,自左至右伸出一株大树,枝冠延至上方。树下一男一女作对话状,女子高髻长衫,男子戴幞头,长袍束带。右侧一童子牵马而立。几只羊散于其间,或食草或奔跑。枝下一单线长方形栏内有阴刻铭文,因磨损而不清晰,依稀可辨“安口府口口同镜”字样。钮下一条长线将水陆隔开,下半部分为湖水双鱼,水波涌动,两条大鲤鱼嬉戏其中,增添了装饰意趣和爱情寓意。此镜制作采用高浮雕技法,层次分明,画面雅致,颇具宋代山水画之妙。“柳毅传书”故事取材于唐代传奇小说,铜镜构图多选取其中“泾水托书”“洞庭传书”“湖滨惜别”三个情节,表现故事的主题内涵,表达人们对美好和平生活的向往。此镜展现的是“泾水托书”的情景,宋金之际将柳毅传书故事物化在铜镜上,流传广泛,延续时间较长,也从侧面反映金代社会生活中大量融入内地传统文化的因素。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